

希望汉学家做中华文化的积极传播者

新华社北京12月4日电 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刘奇葆与来华参加“汉学家与中外文化交流”活动的各国汉学家座谈,希望各国汉学家深入研究和传播中华文化,推动汉学研究繁荣发展,做中华文化的积极传播者,做中外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

座谈会上,刘奇葆先后听取了哈萨克斯坦、以色列、俄罗斯、英国、新加坡、印度、美国、土耳其等国汉学家的发言,与大家坦诚深入交流,感谢各国汉学家为传播中华文化作出的重要贡献。

刘奇葆指出,中华文化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研究好、传播好中华文化,不仅有益于中国人民,而且有益于

世界人民。刘奇葆希望各国汉学家加强中华文化研究,深入挖掘和阐释中华文化,积极推介和传播中华文化,让各国人民更好地感受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希望持续关注、广泛介绍中国梦,让国际社会更好地了解中国、理解中国,认识到实现中国梦是世界各国的机遇。希望积极翻译和推介中国当代优秀作品,把优秀文学、电影电视作品和图书翻译推介给各国人民。

刘奇葆欢迎各国汉学家到中国多走走看看、多交流合作,亲身感受古老的中华文明,深切体验日新月异的当代中国。他要求有关部门积极创造条件,为各国汉学家开展学术研究和交流提供帮助。

铁凝会见尼泊尔客人



本报讯(记者 李晓晨) 中国作协主席铁凝12月4日在北京会见尼泊尔学院代表团一行。

铁凝代表中国作协向远道而来的尼泊尔客人表示欢迎,向他们介绍了中国作协的有关情况,并回顾了中尼两国在文化领域尤其是文学领域开展的交流与合作。她说,中尼两国文化历史源远流长,一批经典文学作品共同构成了世界文学的灿烂图景,尼泊尔经典文学作品长诗《穆娜与马丹》就给中国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文学是了解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方式,中尼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愈加密切,两国人民之间也建立了深厚友谊,希望今后两国在文学领域继续加强合作,推动文学作品的翻译推广、加强文学界出版界的交流互访,增进两国文学界和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

尼泊尔学院院长内姆旺表示,这次他来中国访问充分感受到了中国作家的真诚和坦率,对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学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他说,中国和尼泊尔作为邻国一直以来都保持着良好关系和密切往来,中国文学作品在尼泊尔拥有众多读者。他希望,能将更多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翻译介绍到尼泊尔和有更多的尼泊尔文学作品翻译介绍到中国来,欢迎更多中国作家访问尼泊尔,进一步增进两国文化交流,促进两国文学的发展繁荣。

中国作协副主席钱小芊参加了会见,并与内姆旺共同签署了《中国作协与尼泊尔学院合作协议书》。尼泊尔驻华大使马赫什·库马尔·马斯基以及中国作协有关人员参加了上述活动。

湖南省文联庆祝成立60周年

本报讯 惟楚有才,于斯为盛。三湘大地上曾经孕育了屈原、贾谊、柳宗元等文学大家和艺术巨匠。新中国成立以来,湖南省的文艺队伍凭借湖湘文化的深厚底蕴,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创作活力。11月28日,湖南省文联成立60周年座谈会在长沙举行,湖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守盛出席会议并讲话。

徐守盛对湖南省文联成立60周年表示祝贺,向湖南省文艺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和崇高敬意。他说,60年来,湖南省文联认真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紧紧围绕党在不同时期的中心工作和主要任务,切实履行职能,为推动湖南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当前,湖南已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历史新时期,更需要加快推进文艺事业繁荣发展,需要广大文艺工作者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湖南省文艺工作者要做弘扬主题

律的主乐手、坚守主阵地的生力军、聚正能量的工程师,永远和人民在一起,以感恩之心、敬畏之心去思考和创作,不断开创湖南文艺繁荣发展新局面。

会上,一批从艺60年的老文艺家获颁荣誉证书。部分文艺家代表在发言中回顾湖南文艺60年来的成长历程,展望文艺湘军的前进方向。湖南人民出版社的“湖南文艺六十年”丛书也于同期首发,丛书包括省文联卷、文学卷、戏剧卷、电影卷、电视卷、音乐卷、舞蹈卷、美术卷、书法卷、摄影卷、民间文艺卷、文艺评论卷等,描绘了湖南省文联和各文艺家协会、画院的发展历程,收录了湖南省60年来各文艺门类的优秀作品,彰显了湖南省文艺事业的卓越成就,总结了湖南省文艺发展的宝贵经验。

出席会议的还有夏潮、许又声、韩永文、刘连玉、魏文彬、欧阳斌等。湖南省文联主席谭仲池主持会议。(黎华)

诗人应深化自身对时代的感受力

□本报记者 黄尚恩

新诗诞生至今,已经将近百年,有哪些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总结?面对这个纷繁的现实,诗人如何才能以诗歌来有效地言说?诗人在创作的过程中,应该如何把握“诗”与“思”的关系?如何评估诗歌翻译在新诗发展过程中的作用?12月1日,《诗建设》杂志社和海南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在杭州举办“新诗百年:精神与建设的向度”主题论坛,来自全国各地的30多位诗歌界人士与会,大家结合自己的诗歌实践,就这些诗歌问题展开讨论。

新诗百年,还能否称其为“新”

将五四时期诞生的白话诗称为“新诗”,是将与传统诗词相对立而命名的。在那个时候,“新诗”的叫法契合了一种“一切求新求变”的时代氛围,让白话诗从传统诗词中突围出来。但诗歌评论家徐亚认为,新诗如今已走过将近百年的历程,百年了就不应该再叫“新诗”。“新诗”这个词应该成为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在现在的意义上停止使用”。因为新诗在内涵、外延、形式等方面都形成了自己完整的骨架,而且传统诗词和新诗在现在的语境中已经不是“对立的他者”。

徐亚的观点得到与会者的积极回应。诗歌评论家江弱水提议,在“新诗”即将到百年之际,应该给予更确切的称谓。诗人、翻译家汪剑钊认为,可以用“现代诗”来替换掉“新诗”。“如果只叫‘诗歌’的话,跟传统诗词好像有的时候不太好区分。如果我们用‘现代诗’的概念来替换一下,也许更可行一些。”

但也有与会者提出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新诗”的叫法之所以一直被沿用,是因为新诗“一直没有完成”,“始终处于寻求变化的过程中”。而且,如果仅仅因为新诗到了百年而去更换一个名字,并没有太大的必要性。或者说,即使有必要,也并不是那么迫切。因为与更换名字相比,这样的问题也许更为重要:如何写出更多优秀的诗歌作品?如何让诗歌与时代、社会产生共振,并保留自身的诗意?

表达个体经验,但又具公共性

如何让诗歌能够有效地处理历史、表达现实,这是诗人和诗歌评论家们一直在讨论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一方面是因为现实的复杂性极大地考

验了诗人的写作能力,另一方面是因为诗人试图通过反映现实,让诗歌重新具备“公共性”。

诗人沈苇认为,当一个诗人置身于现实社会之中,其实是置身于人与人、人与万物的关联之中。远方的不幸常常会刺痛我们的心灵,身边的悲剧更是伤及自身而不能置之度外。自然之死、同类之死,是我们身上的一部分在死去。这就是人类美德中的“一体同悲”,它同样是诗歌的美德之一。诗歌仅仅表达自我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表达他人的处境。对他人苦难的同情,并非使我们显得高尚,其实仅仅隐含了强化灵魂之活力、体验自我之力量的朴素愿望。因此,在当下的语境中,诗歌和诗人需要学会更自如地自闭和敞开,像一只珍珠之蚌,其目的是恢复诗人作为“种族触角”、“时代感应器”的特殊功能,深化自身对时代的感受力和回应能力,重建自我与他者的关联,培育诗歌向内、向外的力量。

诗歌应该关注个体,同时又抵达一种公共性。诗歌评论家陈超谈到,中国的诗歌很长一段时间处于“抗辩”的状态之中,存在着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其实,在现在的条件下,我们可以用“整合”的思想来处理一些貌似对立的问题。诗歌既可以表达个人,也可以表达历史、现实。他提出,诗人应该具有一种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诗人可以从个体主体性出发,以独立的精神姿态和话语方式,去处理我们的生存、历史和个体生命中的问题。这样写出的诗歌既有个人性,又有时代生存的历史性。

在诗歌评论家张清华看来,诗歌关注个体,就应该对个体“幽暗的精神世界”引起重视,因为它能够唤起经验的公共性。所谓“幽暗的精神世界”就是个体的一种无意识,很多优秀的诗作因为表达了无意识的微妙变动而具有永久的诗意。这种无意识看上去似乎很“个人化”,但它却奇妙地产生了一种共通性。比如鲁迅的《野草》,它真正打开了现代人幽暗的内心世界,同时也隐喻到了新文化运动的核心思想。在当下,也有很多的诗人去关注无意识,把内心最敏感、隐秘的部分揭示出来,同时又表达出了共同的经验。

“诗”与“思”应合二为一

要想对历史与现实进行有效的表达,诗人必须具备一种综合概括的能力。诗人朵渔认为,诗人在诗歌写作中必须有“思”。诗人在动笔之前,首先要对所要写的对象进行思考,而不是仅仅凭借灵感来写作。

但是,思考的方向正确与否非常重要。如果一开始方向就错了,“思”比“不思”状况还要差。徐亚回应说,写之前的“思考”,也许会让诗人带有一种“定见”进入写作。因此,写作的过程也应该是继续“思”的过程。有时候,写作过程中的“思”会产生颠覆性的思路,改掉写之前的预设。

在诗人冷霜看来,任何时候,写作都不可能离开我们在现实中的所思所感,我们的判断。“思”在“诗”中,合二为一。诗人多多也认为,诗中之“思”与哲学之“思”不一样,它是一种特殊性的“思”,是融在“诗”中之“思”。从这一角度出发,汪剑钊谈到,我们现在很多诗歌具有了“思”,也就是诗性的思考,但却达不到真正“诗”的要求。有一些诗人只注重技巧的打磨,这固然不好。但是,如果诗歌里有内容、有哲思,但没有能力将之表达成“诗”,这也是很遗憾的。从“诗性的思考”到“诗”,有很长的一段距离,诗人们需要更进一步的探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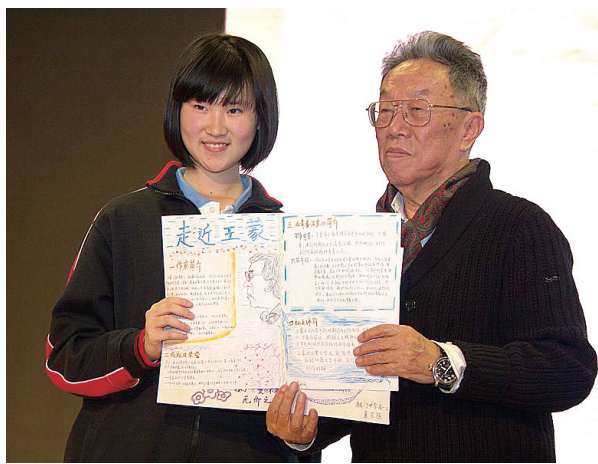
翻译应该引起更大的重视

在新诗的发展过程中,翻译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诗人王家新认为,百年来的诗歌翻译,尤其是“诗人译诗”,在新诗的发展和语言的变革中扮演着“先锋”的角色。翻译是对诗歌语言进行更新的重要方式。它从语言中创造语言,帮助我们“从太熟悉的惯用语体中走出”。可以说,新诗的“现代性”视野、品格和技艺,很大程度上是靠诗歌翻译来推动的。它本身已成为新诗“现代性”艺术实践的一部分,也构成了新诗史上富有价值的一部分。但是,由于“原著中心论”的支配性影响,长久以来中国的诗歌翻译和翻译家们一直笼罩在原作和原作者的阴影之中。翻译的意义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翻译的成就及其对新诗的重要作用在现有的文学史论述中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在汪剑钊看来,翻译工作非常重要,“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人们对诗歌翻译的“重视”,只停留在口头上,在评奖等活动中却又忽视掉它,“这说明大家骨子里对它还是不够重视”。有时候他也会反问自己:“我也能写点诗,为什么要做翻译?”思考的结果是:翻译是否引起重视,翻译家无法左右。翻译,只能成为译者发内心的一种需要,“愿意做就做,不愿意做就放弃吧”。但是很多与会者谈到,应该增强对诗歌翻译的重视,因为翻译是让诗歌保持异质性的力量。

王蒙《青春万岁》出版60周年:

“我们这代人有特殊的幸福”



本报讯 1953年,19岁的王蒙创作完成了他的长篇小说处女作《青春万岁》。此后,这本书和作者一起经历了种种磨难,直到26年后的1979年才得以面世。2013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青春万岁》60周年纪念版。如今,已进入耄耋之年的王蒙依然笔耕不辍,不断地为读者奉献佳作,“青春”的气质和精神在他身上似乎并未走远,反而因岁月的见长而焕发出不一样的光彩。

12月3日,王蒙做客北京市东直门中学,在与同学的交流中讲述了“不同的时代,同样的青春”,并向东直门中学师生赠送了《青春万岁》60周年纪念版图书。在现场,王蒙与同学们分享了自己的青春记忆,他说:“当时的每一个日子都是金光闪闪的,每一天都不一样,每一天都阳光灿烂,每一天都充满希望,每一天都快乐无比,每一天都美好得不得了。”当被问及60年前的青春与现在的青春有什么异同时,王蒙风趣地回答:“谁的青春也不是吃素的。”他认为,不同时代人的青春有不同的特点和表现形式,但共同的特点就是“充满激情、充满探索的热情和对未来的期待”。他说:“我们

这代人特殊的幸福,就是亲身经历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见证了历史的巨大变化。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抗美援朝战争的发生、苏联援建、第一个五年计划等等。这么多令人应接不暇的历史事件在你眼前发生,你会被历史的大风吹着往前走。”

小说《青春万岁》用激情洋溢的笔触描写了上世纪50年代初期的中学生生活,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时代感,其故事背景就发生在当时的北平市立第二女子中学,也就是如今的东直门中学。在现场,王蒙与大家分享了这本书的创作缘起。他说:“我当时接触到很多解放前夕已经受到革命理想感召的年轻人,他们有的参加了共产党,有的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也有的用积极热情的态度来欢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他们有各式各样的个性,有的比较开放一些,有的比较深沉一些,有的站得比较高一点,有的面对各种新宣传、新说法、新组织而存在各种疑虑。”小说中所写的人物和故事集中表现了当时的社会现状,通过一个中学生的视角,呈现了当时巨大的历史变迁和历史变迁所引起的热烈反响。

最后,王蒙还与同学们分享自己在困境中保持“青春”的两个途径:第一,永远不要丧失对生活的兴趣;第二,在最艰难的时候依旧保持学习的热情。他勉励同学们:“困难的处境人人都会碰到,但是我们没有权利悲观,没有权利不善待自己的生命,没有权利停止学习。只要活着,只要还没有完全昏聩,你就要继续学习下去。”(行超)

图为学生代表向王蒙赠送自制的小报

2013年度中国散文年会在京举行

本报讯(记者 王冕) 11月30日,2013年度中国散文年会颁奖大会在京举行,本年度散文评选活动同时揭晓。梁晓声的《龙!龙!龙》、李存葆的《乡村燕事》、丹增的《藏狗》、贺捷生的《木黄,木黄,木色苍黄》、唐兴顺的《太行九记》、周晓枫的《齿痕》等10篇散文获得一等奖,查振科的《童年呼啸》、王惠明的《父亲的水碾坊》等90余篇散文分别获得二、三等奖和“最佳散文集奖”。军旅作家徐怀中的长篇纪实散文《底色》回忆了自己当年在越战中的战地记者经历,控诉了战争带给人类的灾难和暴力,呼唤正义与和平,获得年度“军旅散文奖”。浙江作家袁明华凭《闯荡在灰色的航道上》获得年度“新锐奖”。

一年一度的中国散文年会由《海外文摘》杂志社、《散文选刊·下半月》杂志社等单位主办。本届年会期间还举办了2013年中国散文配乐朗诵会、袁明华散文研讨会、名家讲座等活动,来自全国各地的近百位散文作家参加了年会。

洪耀弹线作品展出

本报讯(记者 王冕) 近日,“洪耀弹线——2013北京展”在北京画院美术馆与观众见面,展览集中展示了洪耀近年来的水墨弹线作品。相关学术研讨会也同期举行,与会画家、评论家就洪耀的创作进行了交流探讨。

洪耀1977年起开始尝试使用弹线作画,把木工之祖鲁班的墨斗手工弹线从几千年的远古转化为当代的艺术语言,形成他作品中特有的艺术符号,可谓装置、行为、绘画的结合。专家认为,洪耀弹线系列作品是对中国艺术史上作为美学概念的“线”进行质疑、反思和革新。他将来自中国古代建筑和木工工艺的“弹线”作为一种艺术反叛的工具和手段,让工具化的、非手工绘制的弹线与墨、宣纸等其他水墨因素之间形成强烈的张力关系。弹线打乱了传统水墨的秩序,推动了传统水墨艺术的现代转化,丰富了油画语言和表现能力。

洪耀表示,自己从小就喜欢看木工师傅用墨斗弹线、锯木板。“难忘儿时的弹棉花机,它弹出单调重复而又雄壮整齐的旋律,穿越了时空,连接着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是我幻想的泉。”

新书贴

《我的人生故事》

周有光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3年10月出版

《我的人生故事》是周有光的散文精选集,从不同角度讲述了他一生中值得记忆和描述的种种有趣的故事。从他简洁明了、幽默迷人的文字中,我们可以了解这位世纪老人永葆青春的秘密,以及他丰富的人生智慧和惊人的思考力。

中国现代文学馆公益讲座预告

时间:12月8日9:30—12:00 主讲人:吴晨昌(作家)

题目:我认识的文学大家